

华东周刊

EAST CHINA WEEKLY

A1 特稿 Feature

总第 161 期 2023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一 主编:马晓才 执行主编:李洁 徐青青 美编:楼燕红 战略合作:

杭商传媒

联系电话:0571-85068763

毛昭晰:浙江文物事业的开拓和引领者

■ 陈文锦 / 文

1983 年以前,我和毛昭晰先生素昧平生,没有任何交集,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。

1983 年 5 月,毛昭晰出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,9 月,我到新组建的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。从此,作为他的袍泽,开始了我们将近四十年的交往。

01

毛昭晰此前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校图书馆馆长,他常常自称是一个教书匠,到文物局来事出偶然,是来帮忙的。有时甚至诙谐地开玩笑说“我是被骗来的”。

其实,从我和毛昭晰最早接触开始,他对文物工作的那股激情、那种执着,使我深深地感到他是带着一种抱负,一种理想来到文物领导岗位的。在当时,文物不仅是个小众团体,无权无势,而且在许多社会场合连说话的份都没有,是个无足轻重的存在。即便是许多为文物工作呼喊的知识分子,也就是觉得历史古迹应予保护、不该被湮没而已,对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性,它的价值,是不会想得太多的。

而毛昭晰不一样,他是少数真正懂得文物社会功能和潜在价值的先知者,他经常告诫我们,文物事关社会的未来,利在当代,功在千秋,要有紧迫感和责任心。他很喜欢引用一个八十年代早期的故事:有一个香港青年代表团来内地参观,领略了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以后,非常激动地说,“过去我们把内地称作大陆,错了,这不是大陆,而是我的祖国!”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,大幅度的形体动作,每听一次,都不能不使每一个在场的人为之动容。所以,他如果不是带着理想和激情,是不会选择这一行的。

毛昭晰极富前瞻性的眼光,是一个有大格局和战略眼光的学者。在杭州大学任教期间开始,就相当关心文物方面的事情,和省里的几位老专家牟永抗、王仕伦、朱伯谦、汪济英都有交往,有机会也会去考古工地看看。所以他对文物系统的状况和着力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。

毛昭晰来后的第二年,果断地拆分了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,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又批准在考古所内部成立了浙江省古建筑维修技术中心,单独运行,专门负责文保古建筑的维修,是为日后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滥觞,迈出了市场化的第一步。

1986 年,毛昭晰在省委老领导李丰平同志的支持下,将省文物局编制增加到 25 人,另增加省考古所个 20 编制。并根据形势的发展,把省文物商店从经营性质改为管理性质,成为管理文物市场和出口鉴定的专门机构。这样,使在文革中处于极度收缩状态的文博队伍,迅速发展壮大,并形成了功能配置合理、架构设置完整的省直文博系统,为文博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,成为全国少数有完整功能配置和架构的少数省份之一,这在当时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中,充其量不会超过四五个。

现在有些人看政绩,往往只强调在他手上完成了几个建设项目,而解决一些长期卡脖子的体制机制的问题,将之改革和调整到位,却常常被人忽略。其实,解决软件方面存在的问题,难度绝不在硬件之下,而且也更有长期和战略的意义。非有大智慧大格局的人,才会作如此之想。这些举措,看起来并不显眼,却为文博各方面人才的成长打开了空间,从人力和资源的布局上夯实了浙江文物大省的基础。

文物部门过去的工作习惯,除非有紧急要务,一般很少外出。毛昭晰深知文物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,需要未雨绸缪。他到职以后,一改往日很少出差的惯例,加大了对地、县文物部门巡视的力度。当时,浙江交通情况很差,去一个偏远一点的县,路上几乎要花一天的时间。他不辞辛苦,轻车简从,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县市,了解各种问题,争取各方面的支持。他那悠雅的学者气质和从容不迫的谈吐,使许多地县分管领导为之折服,为地方的文物部门开拓了生存空间。

当时,我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,正为加强文物工作、理顺园林文物之间的关系而苦恼。1988 年五六月间,毛昭晰乘国家文

物局张德勤局长来杭之际,约请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、杭州市政府的分管领导,加上他和我五人,一起研究如何规范两部门的运作,加强文物系统内部活力和有效运作的办法,并制定出了具体方案,后虽因人事变动没有完全执行,但至少让有关方面感到必须改善杭州文物工作处境的迫切性,对日后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。

为了过河,就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。毛昭晰的睿智,表现在他深知桥和船有多种可能,懂得怎样采取最有效、最适合的途径来达到目的。比如,2001 年杭州市启动了西湖西进、南线整治等重大工程,此时西湖申遗刚刚启动,社会上有一些人觉得这类整治动静太大,不利于日后申遗。毛昭晰在市委主要领导召开的会议上,率先提出要将“西湖综合整治工程”改称为“西湖综合保护工程”,虽然只有一词之差,但内涵提升的力度却很大。事实上,由于名称的变动,工作实践中的重点也发生了微妙变化,“发掘历史碎片,使之串珠成链”成了整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,对西湖申遗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。

1985 年以后,文革中被用作拘留所的郭庄归还给园文局,按照七十年代制定的曲院风荷公园规划,郭庄将会被拆除,改建为曲院风荷公园密林区的一部分。我和毛昭晰商量对策,他说:郭庄现在还不是文保单位,保不保的事不宜张扬。这样吧,由省文物局出个文给园文局,就说郭庄已经被省局内定为下一批省保单位,应予保护。为了减少给园林方面的压力,此文以不带文号的便签形式发出。果不其然,园林方面也接受了这一善意,郭庄终于保了下来。

对于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,毛昭晰具有很高的敏感性。1987 年 4 月底,发生了瑶山遗址被哄抢事件。我在 5 月 1 日晚上向他报告,他当即决定第二天赶赴现场开会,要求立即追缴被盗的文物,依法严肃处理这一哄抢事件,坚决打击破坏文物的犯罪行为。虽然省、市、县三级态度都非常坚决,但当地的阻力是比较大的。据说从乾隆时代起,良渚、瓶窑、长命、安溪一带的农民,掘地时掘着掘着就会有玉璧玉块一类的文物掘出来,时人称之为“汉玉”。民国以后,便常有文物贩子来此收购,改革开放以来,当地农民把它当作是发家致富的意外之财,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他们认为可能的地点深挖。开始收缴时,有的人心存侥幸,认为自己拿到的东西无人看到;有的抵触情绪很大,认为自己是从个人所有的土地上得来的,不是偷来的。所以收效甚微。

毛昭晰抓住这个案子不放,隔三差五地听取汇报,并通过省公安厅督促办理。对拒绝上交的,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终于使这个案子很快结案,公开审判了一批涉案人员,造成很大声势,起到了震慑作用,使良渚一带四个乡的农民,都懂得了“地下文物,概归国有”是一条红线,是不能触碰的。此后,大规模的哄抢盗挖的恶性事件再未发生,保证了以后若干年良渚遗址总体上的平安。

毛昭晰离开文物工作岗位以后,依旧对一些可能影响文物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,保持高度的警觉。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,他曾给时任委员长李鹏写信,要求督促地方对国保单位东周王陵遗址的保护予以落实,不能把经济开发区放在遗址范围以内,不能搞大广场。洛阳问题的解决,为处理好经济开发区和大遗址保护的关系作出了榜样,也为国家文物局日后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02

毛昭晰是博物馆专家,在杭大任教时,他就率先倡议在历史系成立博物馆学专业。他对博物馆的深度了解和推崇,是业内出了名的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全省有馆舍、有基本陈列可以勉强称得上博物馆的,不过六七家之多。我们这些初入行者,对博物馆缺少基本的感性认识,毛昭晰在各种场合不断对我们进行启蒙教育,他说博物馆应该是三驾马车型的,即地誌博物馆(现在一般叫综合博物馆,其实学理上是不严谨的)、专题博物馆(现在统称专业博物馆)、名人纪念馆;而在我们过去,大多数人把名人纪念馆和博物馆当作两回事。

现在很少为人知道的是,毛昭晰为一些重要的捐赠活动所做的努力。八十年代,有很多知名人士来杭州。毛昭晰凭他广泛的社

会联系和良好的个人声望,多方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,广交朋友,获得他们的信任。如新加坡的广洽法师、夏衍同志的女儿沈宁先生、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先生、常书鸿先生的夫人和女儿等。八十年代几次重大的捐赠活动,像广洽法师收藏的李叔同先生的文物,丰子恺先生为其师所绘的《护生画集》,夏衍同志收藏的宋元书画、常书鸿先生的敦煌画作等珍贵文物的捐赠,都是毛昭晰长期做工作的结果,虽然出席的接收方是博物馆,其实一力促成此事的,其真正的幕后操盘手应是毛昭晰莫属,这是不应该忘记的。

03

毛昭晰给人最深的印象,就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。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,都会被他和蔼可亲态度、以理服人的谈吐而折服,和他在一起,颇有古人所说的“如坐春风”那样的感觉。在个人品质方面,他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,值得后人学习。

第一是谦虚谨慎,平易近人。毛昭晰在文物局工作十年,不管有没有烦心事,都从不拿厅长或教授的架子,和人说话时总是那么和和气气、娓娓而谈,喜欢和人聊家常。因此,除了特别正式的场合,大家都乐意叫他毛老师,好像他就是生活中的普通同事一样,没有上下级之间的严格界限。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,或许坚持一阵子是可以的,但毛昭晰却坚持了一辈子,这是常人根本做不到的。他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和声音,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意见去压服别人。

90 年代初,有一次为一个文物维修项目能不能使用钢筋发生争执,有人闹意气说:什么东西都有生老病死,用传统材料修不好的文物,垮塌就应该让它垮塌,文物难道就不能死吗?面对这样无理的抬杠,毛昭晰都没有和人红过脸,而是等事后再进行解释和开导。

其次是关心同志、关爱他人,特别关心在基层文博单位打拼的同志。九十年代初开始评职称的时候,毛昭晰多次向我们这些评委强调:对基层的老同志不仅要看论文,主要是要看实际的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,不能让默默无闻的实干型人才吃亏。对于新入行的同志,他总是满怀热情帮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。河姆渡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邵九华同志,是从教育系统调过来,每次他来局里汇报博物馆建设的进程,毛昭晰总是要和他很长一段时间,从邵九华离开时的笑脸上,可以感觉到他内心非常充实,对工作充满了向往。

此外,像舟山的方宽忠、黄岩的符艺楠、泰顺的夏碎香等,毛昭晰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。有一次在宁波东钱湖史氏家族墓地考察,碰到一位业余文保员,交谈起来,知道他从解放初期开始就担任业余文保员,三十年来一直守护着东钱湖山上的文物。经过和鄞县文管部门核实后,毛昭晰给予了这位业余文保员以很高的评价,邀请他参加全省的文物工作会议,亲自给他发奖状,并号召各地文物部门都要检查所在区域的业余文保员的工作,表彰那些坚守岗位,风里来、雨里去的优秀业余文保员。在他离开文物局工作岗位以后,曾经和我说:这几年文物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多了,他们很多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,现在省博物馆建好了,能不能把他们找到杭州来聚一聚,看看省博的文物,这里也有他们的贡献啊!很可惜,因为主客观的原因,我未能让他去却这番心愿。

第三是公私分明,廉洁奉公。文物系统从前有一个优秀的传统,就是文物工作者自己决不经手买卖文物,也不收藏文物,很多老一辈的专家,一直遵守这条不成文的规矩,毛昭晰也不例外。他在文物局工作期间乃至离开以后,从来没有收藏收买过一件文物,甚至没有在工地上捡过一片瓷片或陶片带回家。他还把在杭大任教期间(主要是文革期间)收藏的一批古钱币,毫不犹豫地无偿捐献给了省博物馆。

章太炎先生的长子章导先生鉴于他和毛昭晰交往的情谊,决意单独送他一件太炎先生手书的书法作品,章导先生当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的面,讲清楚是送给毛昭晰个人的礼品,不在捐献范围之内。毛昭晰收下以后,随即很快地将之正式无偿地捐献给了章太炎纪念馆。

类似这样的事,据我所知,毛昭晰做过

不止一次。对于那些好心要送他一两件礼品留作纪念的捐赠者,只要事涉文物,他不是婉言谢绝就是转手移交给博物馆,真正做到是大公无私。

我和毛昭晰交往近四十年,他和我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:即兄长、老师、上级、同道。毛昭晰长我 15 岁,又是上级,照理应该有辈分不同的区别。前面说过,他和我素昧平生,但我们初次见面,即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虽然我们在学术素养、思想深度、人生轨迹,待人接物的水平上差得太远,但亲切感却油然而生。

毛昭晰一直把我当作他弟弟,他用杭州话说“小阿弟”三个字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他不仅是我在文博业务上的老师,而且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老师,他的学养、睿智、风度,是对于我们后来者很好的言传身教,可惜我教养不够,人又木讷,未能从他身上真正学到什么。

04

作为上级,毛昭晰非常理解我的工作和处境。1991 年我调离园文局,市委要我去市社科联任职,我不愿意离开文物系统,毛昭晰力排众议,说服孙家贤厅长把我调到省文物局。到职以后,省里许多熟悉我的老同志对我开玩笑说:“你是力主园林文物合并的始作俑者,怎么被他们赶了出来?”毛昭晰则不一样,他怕伤我的自尊,从来不提这些事情,而在工作上,依旧对我非常放手。

毛昭晰的信任,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。本来,我以为自己从市局到省局,系统内的调动是很正常的,直到后来省文物局有人指责我是“开后门进来的”,我才知道这里面阻力很大,毛昭晰为我的调动是承担了风险的,这确实是一种难忘的知遇之恩。

至于用到“同道”这个词,或许有些唐突和失敬。事实上,毛昭晰不止一次说过:“不管碰到什么事情,我和陈文锦的看法总是一致的。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商量过的,其实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对方会说什么,但是心是相通的。”古代汉语中的同道,意指有相同志向和追求的人,从这一点上看,我称毛昭晰为“同道”,虽然略有高攀,但多少还说得过去。

心的相通,其实就是具有相同的价值观,就是思想上、理念上的契合。对好多问题,我们都有相同的认识。在文物工作领域里,我们更有着诸多的共同语言。我们都主张文物工作要面向社会,服务大局,有一些表面上与自己本行关系不大的事该做的还是要做,比如前面提到的章太炎逝世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,有些人认为花那么大的劲,是干了社科院该干的活,与建纪念馆关系不大。其实,这里面的缘由前面已经说了。毛昭晰与许多文化界、学术界的人交朋友,实际上都是在更高层次上为文物工作铺路。

在文物界内部,我们都希望文物界能改变相对自我封闭的种种陈规陋习,一是要放开胸怀迎接愿意服务文物界的新人,包括大学生和转行来的,善待他们,不要冷眼相待;二是不要一碰到问题,就只有 yes 和 no 两选一的零和博弈,有的可以更包容一些,有的可以协调一下,各退一步。

1987 年,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来杭州,毛昭晰和我在马坡巷龚自珍故居门口迎接他,据说是龚自珍女儿一系的后裔,他认可了我们对故居的判断,并为它题了词。但有的同志不认可,认为依据不足,这当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。但古人对自己故里的描述,一般都只说到那个坊或那条巷,很少有报出门牌号码的。古代的名人故居,保留着原有建筑的概率几乎微乎其微,绝大多数是后代重建的。所以我们认定马坡巷一幢清代中后期的建筑为龚自珍故居,其实方位上的误差很小。在其他很多文博具体业务问题上,我们大致也有相同的认识,从个人角度讲,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忘年之交了。

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毛昭晰虽然离我们远去了,作为浙江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和引领者,他的业绩和品格,会长久存留在浙江的土地上。新一代的浙江文博人,一定会继续毛昭晰的事业,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用他们的双手,托起浙江文博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!

(作者系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,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,杭州市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,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原会长。)